

# 第一章

## 北京政府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软弱性，政权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建立了以北洋军阀为主导的北京政府，从此开始了北京政府时期。但由于辛亥革命某些成果尚存，北京政府在实行军阀专制统治的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工商实业的政策措施；直隶省民间政界一些人士兴办实业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在对华进行侵略压迫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等等。因此，直隶省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工矿企业、金融业等。传统农业经济仍占居主导地位，旧的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但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某些变迁，某些农产品呈现商品化趋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也日趋增强。随着商贸环境的改善和市场的扩大，直隶省的内外贸易也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式商业，外国资本势力也进一步深入直隶市场。这些变化对直隶经济向近代化转轨均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第一节 民国成立后的直隶省情

### 一、民初直隶政情及省府机构演变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于1912年1月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把握住革命政权，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通过策动北京兵变等一系列阴谋手段，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同意他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4月5日，临时政府议决北迁。袁世凯如愿以偿，终于在北京建立了以他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独裁政权，中国开始进入北京政府时期。

直隶省是京畿之区，又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发迹之地，因此袁世凯及其后任都非常重视加强对直隶的直接控制，想方设法安插自己的亲信督理直隶省军政大权，袁世凯上台不久发生的“直督之争”，即为典型事例之一。在袁世凯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南京临时参议院曾通过一个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直隶等未独立各省，须撤除原有都督，由各该省临时参议会重新推举。但袁世凯怕这样做会削弱他对直隶等省的控制，遂拒绝此议，于1912年3月11日抢先任命其亲信张锡銮署理直隶都督兼民政长，仍开府天津，是为直隶都督府之始。

张锡銮上任后，直隶省咨议局（即顺直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咨议局推举的惯例，复推举曾任广西军政府副都督、后任南军第三军军长并与同盟会比较接近的直隶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孙中山根据吴景濂、谷钟秀等参议员的建议，亦急电袁世凯照案加委。袁世凯表面首肯，暗中却指使张锡銮操纵部下表示反对。在张的纵容下，很快出现了一个所谓直隶五路军反对王芝祥任直督的电报，袁世凯遂以军队反对为由，拒绝了孙中山等人的要求，并蛮横地表示，

直隶等省都督业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遂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直督仍由张锡奎充任。3个月后，即1912年9月，张锡奎改任东三省西边宣抚使，袁世凯又任命心腹将领冯国璋为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并仍兼禁卫军统领职。冯国璋上任后完全仰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他独断人、财、政大权，凡事不提交省议会讨论，使省议会颇为不满。11月初，直隶省议会向冯国璋提出四项要求：(1)都督府各官一律更换；(2)任用司道得省议会同意；(3)各州知事考试录用；(4)财政由省议会举人管理。冯国璋对此颇为不满，曾佯电辞职以为要挟。袁世凯得悉后再度电斥省议会干预用人行政。在袁的纵容下，冯国璋仍恣意专权，省议会所提要求形同具文，没有实际效力。

1913年1月8日，袁世凯先后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政令，提出所谓“军民分治”，着手改组各省地方机构。根据上述政令，直隶都督府改组为直隶行政公署，作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仍驻天津。行政公署内设民政长，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总理全省行政事务。当时冯国璋仍任直隶都督，暂兼民政长。省直机构则废除了清末的布政使、提法使、劝业道等机构，设立内务、财政、教育、实业等司。各司设司长1人，总理本司事务，以民政长名义执行公务，均不独立对外。省级司法机关则为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等。

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新的《省官制》，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直隶省行政公署也改称直隶巡按使公署，仍驻天津。直隶巡按使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管辖全省民政和警备、巡防武装，依据法令、教令，得发布省令和省单行章程；受中央政府特别委任，监督全省财政和司法行政，考核财政和司法官吏。直隶巡按使一般由直隶都督、将军（1914年6月30日各省都督裁撤，改设将军）督军（1916年7月各省将军改称督军）兼任。1914年，朱家宝曾兼任直隶巡按使。

直隶省行政公署改称直隶巡按使公署后，省直属机构各司改设为厅。各厅机构设置和职掌是：政务厅，内设总务、内务、教育、实业4科，各科职掌略同旧制各司。该厅为巡按使公署行政枢纽，在直隶

巡按使管辖下综理全署政务。财政厅，在业务上直隶于国务院财政部，厅长由财政总长提请大总统任免。厅长的职位有法律予以特殊保障，便于他在省内行使职权。实行此项制度后，直隶省的财政，包括税收、行政经费、预决算等，便直接操纵于中央财政部，直隶省署只能监督而不能指挥其业务。教育厅，掌管全省教育事业，但在业务上亦直接归教育部管辖。实业厅，掌理全省工、农、商等实业，业务上亦同时接受中央农商部的指挥。这些行政制度的推行，使掌握中央政权的大军阀便于对直隶省财政经济的控制。这时期直隶省司法机构仍同前制。

1916年6月6日，因复辟帝制而陷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次日，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职务。7月6日，黎元洪下令将各省督理军务长官由将军改称督军，民政长官由巡按使改称省长。朱家宝被任命为直隶省长兼署直隶督军。9月16日，北京政府特任曹锟为直隶督军。此后直至1928年6月，为直隶省长公署时期。这一时期省府机构照旧，仍设政务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及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等。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国内政局多变，直隶省行政机构亦随政局多有变迁。如上所述，直隶省政府曾用直隶都督府、直隶省行政公署、直隶巡按使公署、直隶省长公署等称谓，尽管名称不同，但其军阀主政的实质没有改变。其主要特点是军政合一，军阀操纵省治权柄。自1912年3月至1928年5月的16年中，中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直皖战争、第一和第二直奉战争等重大事变，对位于京畿之区的直隶省均产生重要影响。各派军阀在直隶省争权夺地，混战不休，使直隶省人民饱经忧患。

另一方面，作为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毕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的条件。许多封建束缚被打破，传统经济和传统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关于发展实业以使国强民富的主张使很多人受到莫大鼓舞，许多货币持有者纷纷投资工商企业，走上了兴办实业之路，倡导实业蔚然风

起。这些影响是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消失的。就北京政府来说，虽然军阀割据 政治腐败 但从中央到地方某些主管经济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多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制定或推行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令 甚至他们自己就是投资者或经营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如张謇任农商总长期间制定的《关于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公司保息条例》、《矿业条例》、《商会法》、《商人通例》等法规条例 对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均有助益。即使是一些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 受利益的驱使 也把聚敛来的一部分资财投资于近代工商业。如曹锟、曹锐、王占元、田中玉、李纯、蔡成勋等人在天津、保定等地的工商企业中均有大笔投资。在上述情况下 直隶省当局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兴办工商实业的措施 并创办了一些官办企业和官商合办企业 这对直隶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 二、辖区建置及人口状况

### (一) 辖区建置

民国元年(1912)，直隶省辖区地方建置仍袭清末旧制，领 12 府、7 直隶州、3 直隶厅 共辖 158 州县。

1913 年一二月间，根据北京政府颁布的《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等法令 废除清制 府(顺天府除外)州、厅一律改制为县 并在省县之间设 4 个观察使 俗也称“道”。其职权主要是监督辖区官吏、节制调遣辖区内部队、监督区内财政司法等项。1914 年观察使改称道尹，观察使署亦改称道尹公署。最初设立的有渤海(包括原天津、河间、永平、承德、朝阳 5 府及遵化、赤峰 2 直隶州)、范阳(包括原保定、正定 2 府及易、定、深 3 直隶州)、冀南(包括原大名、广平、顺德 3 府及冀、赵 2 直隶州)、口北(包括原宣化府及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 3 直隶厅) 4 道。

1914 年 6 月，北京政府设立察哈尔特别区域和热河特别区域，直隶省则把原来 4 道改置为津海、保定、大名、口北 4 道。将直隶省长城以北原承德、朝阳 2 府及赤峰直隶州所辖 14 县改隶热河特别

区 将原口北 3 厅 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 划归察哈尔特别区。10 月，复改顺天府为京兆特别区域，此前曾以顺天府之文安、保定、大城、宁河 4 县划归津海道。至是，直隶省所领共 4 道、119 县。各道设置情况如下<sup>①</sup>。

### 津海道

道尹公署驻天津县。原为渤海道，辖 42 县。1914 年除上述为设立热河特别区和京兆特别区而划出划入的县份外，尚余宁河、文安、保定（新镇）、大城、沧县、天津、青县、静海、南皮、盐山、庆云、景县、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丘、交河、宁津、吴桥、东光、故城、滦县、卢龙、抚宁、昌黎、乐亭、临榆、迁安、玉田、丰润、遵化等 32 县。

### 保定道

道尹公署驻清苑县。原为范阳道。辖清苑、安国（祁州）、安新（安州）、满城、徐水、定兴、新城、唐县、博野、望都、容城、完县、蠡县、雄县、束鹿、高阳、晋县、正定、获鹿、井陘、阜平、行唐、灵寿、平山、元氏、赞皇、藁城、新乐、栾城、无极、涞水、涞源（广昌）、易县、曲阳、深泽、定县、武强、饶阳、安平、深县共 40 县。

### 大名道

道尹公署驻大名县。原为冀南道。辖大名、濮阳、南乐、清丰、东明、长垣、磁县、永年、曲周、肥乡、鸡泽、邯郸、成安、广平、威县、清河、邢台、沙河、南和、平乡、广宗、唐山（原文如此，见《河北省志·政府志》）、内邱、巨鹿、任县、南宫、枣强、新河、武邑、衡水、冀县、柏乡、隆平（治今隆尧镇）、高邑、宁晋、临城、赵县等 37 县。

### 口北道

道尹公署驻宣化县。1913 年 2 月以宣化府所属 10 县及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 3 厅合置，3 厅改置张北县、独石县、多伦县。1914 年仍为口北道，将张北、独石、多伦 3 县划归察哈尔特别区域。

<sup>①</sup> 参见《河北省志·建置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81—187 页。

此时口北道辖蔚县、延庆、涿鹿(保安)、宣化、赤城、万全、龙关(龙门)、怀来、阳原、怀安等 10 县。

1914 年 6 月原直隶省境内的察哈尔、热河改置为特别行政区，分设都统署治称都统府治理军政事务，两都统府分驻张家口、承德，这两个特别区在行政上脱离了直隶省的管辖而独立。与此同时，顺天府改为京兆特别区后，也结束了与直隶省混杂不清的牵连关系。

## (二) 人口状况

人口数量及其状况是构成国情、省情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一国、一省、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从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的民政部到民国元年(1912)以及随后内务部对全国各省区的人口状况均做过一些调查统计，但由于政局不稳、战乱频仍、技术落后等原因，这些统计资料多不完全。一些团体或学者个人所做的调查统计虽较为可靠，但也只能反映个别地区的人口状况。但在目前情况下，下面所罗列的一些资料仍可使读者对直隶省的人口状况有个大概的了解。

民国元年(1912)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布修正宣统年间民政部户口统计表，是为民初北京政府发布的第一份人口统计资料。该表显示：截止 1911 年，直隶全省共有户数 5 187 758 户，计有人口 26 721 353 人，其中男 14 773 617 人，女 11 947 736 人，男女性别比为 123.6 : 100。平均每户 5.13 人<sup>①</sup>。但该表把京师内外城和顺天府 24 属一并包括在内，而热河所属之承德、朝阳 2 府却未统计在内。另据北京政府国务院统计局民国初年调查统计，顺直地区总户数为 4 874 327 户，总人口为 25 932 467 人，该表亦未把承德等 14 县统计在内，也未包括京师的户数人口。如果把京师的户数(148 093 户)人口(789 123 人)添加在内，则与内务部民国元年发布的统计数字相差无几<sup>②</sup>。

① 《中国经济年鉴》(上)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C2—3 页。

② 《中国年鉴》(第一回)商务印书馆 1924 年版，第 49 页。

另据邮政局人口报告表统计,1919、1920、1925年直隶省人口分别为34 186 711人、34 186 711人(原载如此)、38 905 653人<sup>①</sup>。据提供资料的交通部统计科科长王仲武称,这几年数字“系各省地方官概括之数”所以未尽十分确切。略加分析,也的确如此。1920年与1919年人口数没有丝毫变化,这是不可能的。而1925年人口数比1920年陡然增加470多万,平均每年增加27.6%,也似增加过速。而且邮政局的统计是按照邮区划分的,与行政区划亦不尽相符。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内政部曾颁布《户口编查条例》,飭令各省遵照办理。河北省据此上报的人口数字是,全省共计5 452 347户,31 232 131人,其中男17 274 341人,女13 957 790人,男女性别比为123.8:100,平均每户5.72人<sup>②</sup>,高于全国每户5.27人的平均水平。由于这是河北省政府根据《户口编查条例》正式上报的数字,所以似比其他数字较为可靠。该数字虽系1928年所陈报,但仍可做为考察直隶省后期人口状况的参考。许道夫在考察1840年至1947年全国人口状况时亦采用了这个数字。许道夫在考察1910年河北(直隶)人口情况时,亦采用了前述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sup>③</sup>。根据这些数字计算,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直隶省的人口增加了45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增加28万人左右。

从居住区及职别上看,直隶省与其他省区一样,绝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据中央土地委员会1927年的估计,中国农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另据国民政府立法院1928年之统计,河北省农村人口占86%,热河占80%,察哈尔占78%<sup>④</sup>。可见直隶省(河北)农村人口比例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据许道夫统

① 《中国经济年鉴》(上)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C23页。

② 《中国经济年鉴》(上)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C19页。

③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④ 《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B1页。

计,1914直隶省有农户464.3万户,农业人口2411.7万人,约占民国初年直隶省人口总数的90%。说明民国初年直隶省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高于河北省初建时期的比例。

从农村人口的职业状况上看,直接从事粮、棉、油料等种植业的农民占绝大多数,只有一小部分人兼营织布、作小贩等职业。据社会学家李景汉等人在定县所做的调查资料显示,该县以农业为主者占85%左右。各村男子除种地以外,以织布、作小贩、卖木料、打苇箔的居多。女子除田间劳动外,以从事纺纱织布的为最多。另据对定县大王藕村的调查统计,在该村1451口人中,从事农业的男女为1236人,占该村人口总数的85%以上,而从事个体手工业、商业、其他职业及上学、无业等人员,仅占不到15%<sup>①</sup>。

由于政治制度腐败和生产水平非常低下,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过着衣不暇暖、食不果腹的生活。据戴乐仁(J. B. Taylor)1924年对直隶3532户农家的调查估计,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穷人口占80%以上。戴乐仁所划的贫困线标准为人年均必须生活费150元,若按许仕廉、林东海划定的175元和250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则贫穷人口所占比例将会更大。

由于生活贫穷、教育落后,直隶河北省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极低。据1928年统计,河北省每百万人口中,仅有大专学生137人,每1万人口中,仅有中等学校学生9.17人,每1000人口中,仅有小学生34人。照此计算,大中小在校学生尚不到人口总数的3.4%。而直隶河北省的教育水平,当时在全国尚属上游。人口文化素质的低下,专业技术人才的极其短缺,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三) 城市的变迁

①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6页。

② 《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四年续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B24页。

如上卷所述，直隶省近代城市主要也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的。自 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古老封闭的大门以后，外国资本大举入侵，加快了近代城市的发展。直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也和其他省区一样，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在帝国主义威胁下直接开为商埠的城市如天津等市，有的是由于工矿业的开发而兴起的城市如唐山市，有的则是因修建铁路及物资集散作用的增强而新兴的城市如石家庄等，还有因边贸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如张家口市。这些情况在上卷已有论说，在此不再赘述。

到民国年间，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改善，直隶省的一些城市继续呈现发展的势头，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功能逐渐增强。如位于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交汇枢纽的石家庄，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已由正太铁路通车前的不足 0.1 平方公里，扩展到 1 平方公里，1925 年扩展为 1.8 平方公里，30 年代初更扩展到 18 平方公里<sup>①</sup>。20 年代中期，一批近代化的中小企业，如大兴纱厂、兴华棉业公司、万华肥皂公司、新记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同义兴铁工厂、永聚兴铁工厂、立荣元轧花厂、亚立工厂等 20 多家企业陆续创办。商业、餐饮服务业、运输业等发展也很快。石家庄已形成集工业、商业、服务业、运输业为一体的城镇聚落。1925 年 4 月，石家庄商会呈请自治建市。6 月，北京临时执政府批准直隶省属唐山、正定、获鹿等 11 个城镇自 7 月起实行市自治制。因石家庄不满规定的人口数，遂将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在内，取石家庄、休门各一字改称“石门市”，全市人口 3.3 万人。1926 年石门建立了市政公所，其他市政管理机构也陆续建立。1928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普通市组织法》，规定满 20 万人口的城镇方可设市，并将“市”定为地方行政建制。因石门不符合该项条件，所以行政上仍归获鹿县管辖。虽然如此，石门作为冀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其作为该区物资集散中心的

<sup>①</sup>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年版，第 111 页。

“市”的作用仍在不断增强。

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开平煤矿、滦州煤矿及启新洋灰公司等大型近代工矿企业的陆续开办，唐山的市镇规模日益扩大。20世纪一二十年代随着国内兴办实业高潮的兴起，一些与铁路、煤炭、水泥有关的工业部门以及商业、运输业等进一步发展。唐山修车厂、启新瓷厂、启新机修厂、华记发电厂、德盛窑业厂、华新纺纱公司、中国造胰厂等一批近代企业相继建成投产。与此同时，商业、服务业等也有较快发展，兴起了大世界、瑞生成、隆义栈、瑞信栈等一批近代化的商店，铁路以南的小山一带已形成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区规模不断扩大，市内人口迅速增加。唐山逐步发展为直隶东北部的一座以煤炭工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

20世纪前期，以港兴市的秦皇岛也有较快的发展。1915年秦皇岛港出入船只近900艘，吞吐量151万多吨，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070.4万海关两，成为直隶省东北部地区继天津之后又一重要贸易口岸。航运、进出口贸易促进了该地近代工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山海关造船厂、耀华玻璃公司、新中罐头公司、秦榆电灯公司、柳江煤矿、长城煤矿、发电厂等一批新建和扩建的厂矿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商贸日渐繁荣。20年代中期港口区人口将近1.5万人。自1919年起，以朱启钤为首的地方自治公益会，对北戴河进行了有计划的开发建设。他们筹措款项，修路筑桥、植树绿化、开辟公园、设立医院、学校、开设体育场、高尔夫球场等文化体育娱乐场所，使北戴河海滨的市政建设和管理逐渐纳入比较规范化的轨道，交通、服务等旅游设施日臻完善。30年代初有60多个国籍的外国人来此旅游避暑，1933年来此消夏的达1.8万多人次。秦皇岛作为直隶省能源输出港口和避暑胜地的城市特色日益突出。

以沟通内地和蒙古互市贸易而兴起的塞北重镇张家口，20世纪

① 徐纯性主编：《河北城市发展史》第179页。

一二十年代工商业经济亦有所发展。1917年官商合办的龙关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翌年又开发烟筒山铁矿区，公司更名为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是近代河北最大的铁矿公司。1918年张(家口)库(伦)公路正式通车，几十家官办、商办的汽车行闻风而起，相继投入运营。张库公路的通车进一步沟通了与内外蒙古的经贸往来，张家口皮毛业更为兴旺，各种皮毛栈行、作坊达760多家，从业人员达3.2万多人，其他各类商号、外馆、洋行数千家，进出口贸易额达3亿元<sup>①</sup>。张家口成为享誉中外的“皮都”和近代河北西北部主要工商业重镇。

与上述一些城镇因经济地理等因素而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同时，有一些城镇却因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等因素而趋于停滞或衰落，如承德、保定、宣化、正定等。保定历史上曾是河北的军事重镇和政治文化中心，晚清以来一直是直隶巡抚、直隶总督署的所在地，手工业、商业亦较为发达。而随着近代以来天津崛起为华北的经济文化中心，直隶总督长驻天津。民国建立以后，直隶省会迁驻天津，保定府尹公署亦行撤销，保定作为直隶省的政治中心地位随之丧失，这对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造成不利的影响。缘清王朝避暑山庄而兴起的承德市，随着近代以来清王朝统治的衰败、灭亡而日趋衰敝。民国建立以后，盘踞在此的军阀只知盗卖、劫掠和破坏文物古迹而不思建设，其经济文化的停滞和衰落也是难以避免的。

宣化、正定等城镇原来手工业、商业均有一定基础，但近代以来随着张家口、石家庄等城镇的兴起，这两个城镇的经济地位遂被张家口、石家庄所取代。近代以来虽然诸多河北城镇因各种因素有兴有衰，但多数城镇因历史等原因其作为本地物资集散中心的作用并未消失，如保定市仍然是冀中地区的主要工商业城市之一，其居住人口和工商业经济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近代河北城市的变迁是河北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缩

<sup>①</sup> 徐纯性主编：《河北城市发展史》第26页。

影。一些大城市的综合性功能显著增强，如当时作为直隶省省会的天津市 不仅是直隶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而且是全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和进出口贸易口岸，其经济地位远远超过了北京市。由于经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城市自身的特色也日益明显。如后兴起的石家庄市做为冀中平原的铁路交通枢纽，在沟通与相邻省市物资交流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唐山市则成为以煤炭、水泥等工矿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秦皇岛则成为冀东地区以输出煤炭为主的港口城市。张家口则仍保持着“皮都”的地位。其他一些城镇有的也有自己的某些特色 在此不再枚举。

新城市的兴起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 城市交通、服务设施的逐步改善等等，是近代河北城市经济发展的表征。近代工业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经济的相对发展及其辐射作用的增强，又必然带动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近代河北城市的变迁也不能不打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虽然除天津以外的河北城市没有帝国主义的租界，但一些重要的厂矿企业也多受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国资本对近代河北城市经济的渗透逐渐增强。

### 三、自然地理概观

直隶省的地理位置、地貌形态、地质条件、水文气候、河流洼淀等自然条件，对该省经济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方面。其有利的方面是自然地理状况多样化 便于进行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再有就是煤、铁等矿产资源丰富，便于进行工矿业的开发。不利的方面是地形、气候、河流等特征又容易造成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洪、涝、旱、碱等灾害十分突出 给全省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危害。下面对直隶省自然地理状况做一简要描述。

#### （一）地貌特征

直隶省是中国北部一个傍山面海的省份，总的地形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部山峦迭起，东南部平原展布。其主要地貌特征是：一是高差较大。西北部的高原、山地海拔多在 1 000 米以上 有



地。分布于山麓平原的褐土，土层较厚，宜耕期长，适宜粮棉油等作物生长。潮土又称“冲击土”，主要分布于滦河、海河和滨海平原。潮土土质疏松，水分条件较好，但有机养分不太充足。棕壤土又称“棕色森林土”，是该省主要山地土壤，多分布于太行山、燕山的中、低山区和丘陵。棕壤土质地以黏性壤为主，通透性和宜耕性较差。粗骨土主要分布在太行山、燕山的石质山丘，土层浅薄，砾石混杂。栗钙土是该省最主要的草原土壤，分布于冀西北坝上高原，土质多呈弱碱性和碱性。石质土分布于石质山区，如太行山的石灰岩中山阳坡、低山、丘陵，冀北石质山地与丘陵顶部。土层瘠薄，土石混杂，多为荒山荒坡。滨海盐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沿海地带，地下水水位高，矿化度高，土壤含盐量高，多为生长着耐盐植物的荒地。灰黑土是省内重要的森林土壤，多分布于围场坝上林区，土质呈弱酸性，腐殖质层较厚，适宜耕作。草甸土分布于坝上高原湖淖周边的下湿滩地及山区河流谷地，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通透性好，适宜耕作。此外还有风沙土、灌淤土、沼泽土、红黏土等等，多可用于农作。

该省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季风现象较为显著。四季分明，寒暑悬殊。冬天寒冷少雪，春季干燥多风，夏日炎热多雨，秋日晴朗，寒暖适中。

境内雨期集中，干湿期明显，热量和光照资源比较丰富。年日照时数约为 2500~3100 小时，年总太阳辐射量约为 5000~6000 兆焦/平方米。全年日照时数北部多，南部少，沿海平原多，山麓平原少。全省温差较大，极端最高气温超过 40℃，极端最低气温多在 -30℃ 以下，气温由北向南逐渐呈递增趋势。全省年平均气温南北相差 14 以上，东西相差 6 左右。无霜期也是自北向南相应递增，南部地区无霜冻期达 200 天以上，西北部、北部山区无霜冻期只有 120~170 天左右，坝上仅在 100 天以下。

境内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降水变率大，年际降水量变化显著。省内年平均降水量介于 340~800 毫米之间，但地区分布极不均匀，总的趋势是东南部多于西北部，沿海多，内陆少，山地迎风坡多，背风坡

少。如燕山南麓一些低山丘陵区，年平均降水量达 700 ~ 800 毫米，而坝上高原缺雨区，年均降水量不到 400 毫米。夏季雨水充沛，冬春普遍少雨雪。降水分布不均 容易造成旱、涝、洪等自然灾害。

### (三) 河流水系

受上述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该省发育了众多河流，分属海河、滦河、辽河和内陆河几大水系。海河水系是境内最大水系，由漳卫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等河流组成，控制流域面积 12 万多平方公里。这些河系汇集了太行山、燕山山地的来水，形成巨大的扇形水系，出山口后流经平原地区，最后集中于天津附近经海河干流渲泄入海。

滦河水系干流由闪电河、大滦河和滦河组成。滦河源远流长，支流众多，水量充沛，控制流域面积 4 万多平方公里。上游多为山区，流域面积宽度达 100 公里以上，滦县以下至海口平均宽度仅 20 公里。上宽下窄的流域地形使该河也易发洪灾。

内陆河水系位于坝上地区，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短小众多，多数河流属季节性河流。辽河水系为老哈河上源，发源于围场及平泉县，许多支流属山溪性河流。

总的看，直隶省水资源不够丰沛，而且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年际和季节变率较大，加之水利设施极其落后，使该省成为旱、涝、洪等自然灾害多发的省分之一。冬春易发生旱灾，夏季易发生洪涝。旱、涝、洪等灾害成为影响该省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的自然因素之一。

## 第二节 农村经济的变迁

### 一、“兴农”政策措施与农业生产概况

#### (一) “兴农”政策措施

北京政府初期，朝野各界曾兴起创办实业的热潮，此时的所谓实业，主要是指工矿业和商业。但由于农业毕竟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经济部门和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所以北京政府对农业问题也给予了

一定的关注。一些民间团体和人士也提出了兴办近代农业的主张。北京政府主管农业的部门是农商部，在各省属实业厅。这些政府职能部门虽因政局动荡、经费奇缺、人才匮乏等因素，在发展近代农业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还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在兴办农业教育、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等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如 1914 年 3 月 张謇主持的农商部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29 条，鼓励私人出资出力开垦荒地，对承垦者给予优惠地价，并且不允许私自将大片荒地抵售给外国人。同年 4 月 该部还发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8 条，对扩充或改良植棉和种植制糖原料者及改良羊种者实行奖励，并酌给奖金，还积极提倡引进国外的优良品种。此后 北京政府又陆续颁布了《边荒承垦条例》、《垦辟蒙荒奖励办法》、《造林奖励条例》、《种畜试验场暂行规则》等法令法规<sup>①</sup>。其中《造林奖励条例》明定对造林有成绩者，依其造林面积和成活年限，分别核给四至一等奖章，最高者可由大总统特别给奖。还把每年的清明节确定为“植树节”，以培养植树造林风气。这些政策法规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不可能很好的贯彻实行，但其主张发展以农为主的多种经营以及重视农、林、牧、副业技术和品种改良的政策导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解决农业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问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 6 所农业专门学校和 200 多所农业学校。其中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规模较大、历史最久<sup>②</sup>。1923 年 2 月 该校改称河北大学农科。该校为直隶省培养了一些农业技术人才。直隶省还建有甲、乙种农业学校数所，1914 年有学生 440 多人。

为试验和推广农业新技术，农商部和直隶省当局相继设立了一

<sup>①</sup>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 534 页。

<sup>②</sup> 该校前身为光绪二年（1876 年）农务局在保定附设的农务学堂及试验场，光绪三十年（1904 年）改为高等农业学堂。